

南河下:扬州盐业史的微考察

薛平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 225009)

摘要:扬州盐业之兴始于西汉,最盛期是在明清之际,南河下与扬州盐业的关系主要也就在这个时期。明代中期,扬州建新城,南河下是新城的一部分。这里,盐商聚集。经过历史的积淀,南河下留下了很多盐商与盐业经济的遗迹、遗事。扬州能成为“淮盐”产销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引市街”的街名能说出其中的道理。扬州在中国盐业中的独特经济地理,还可以通过“四岸公所”及其“岸”字来说明。南河下是扬州盐文化旅游的重要区域,南河下见证了扬州的半部盐业史。

关键词:盐业;盐商;南河下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7)01-0001-06

“扬州繁华以盐盛”,南河下作为扬州一条历史文化名街和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其兴盛也与“盐”字息息相关。“嵯客连樯拥巨资,朱门河下锁葳蕤。乡音歙语兼秦语,不问人名但问旗。”这是清朝何嘉延《扬州竹枝词》描绘的南河下街^[1]。今天的扬州南河下历史文化街区,与盐有关的历史文化遗存可谓林林总总,有许多盐商的“大宅门”(私宅、会馆),还有特别的一个“所”——四岸公所、一条“街”——引市街、一座“庙”——盐宗庙,它们仿佛在不停地诉说着扬州曾经的辉煌历史。

一、两淮盐业——扬州盐产地

扬州的盐是“淮盐”,因其出自“两淮盐区”。“两淮盐区”地处黄海之滨,南界两浙,北接山东,因淮河横贯其间,历史上习称淮河以南为“淮南盐场”,淮河以北为“淮北盐场”。两场的盐虽然总称“淮盐”,其实制作工艺各有不同,成品亦有所不同。“淮南之盐利用煎,淮北之盐利用晒。”^[2]淮南盐小籽,淮北盐大籽。

依据信史,扬州盐业之兴始于西汉,吴王刘濞“煮海水为盐”,为了便利盐运,他还从扬州茱萸湾到海陵(泰州)和如皋蟠溪开凿了一条河,后来

称为盐运河。唐代诗人许棠《送李员外知扬子州留后》诗句“冶例开山铸,民多酌海煎”写的就是这一历史^[3]。当然,在那时,南河下还远未形成,但其后来繁兴的历史机缘无疑肇端于此。两淮盐业及扬州盐业真正兴盛是从唐代开始。隋唐以前,封建统治者较为注意西北盐的生产、运输、销售,而较少注意东南盐业。自唐代以后,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经济开始超过北方,两淮盐区的盐业生产为此有了极大发展,盐产量增多,从而奠定了它在全国盐业生产中的主要地位。“两淮盐区”的盐有两大特点:一是质地优。淮南通州、泰州一带古属吴地,因而汉时的“淮盐”称为“吴盐”,唐李白《梁园吟》诗中的“吴盐如花皎白雪”和北宋周邦彦词中的“吴盐胜雪”描述的就是淮盐的上乘品质,白是其最大特点。今人则用“色白、粒大、干”等质朴之语夸赞“淮盐”。唐诗中多次提到、连皇帝都爱食用的“盐梅”,就是用质量上乘的淮盐腌制的杨梅。二是产量大。为了保证食盐运输销售,唐代刘晏在“两淮盐区”设置巡院十三,派驻干员、判官多至数十人,两淮盐业生产已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淮盐”产量之大有一则史料为证。有一年,一向依靠池盐的京城长安,因池盐生产受灾,盐产量锐减,“京师盐暴贵”,刘

收稿日期:2016-12-10

作者简介:薛平(1965—),男,江苏扬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工作与历史学研究。

晏“诏取三万斛以贍关中,自扬州四旬至都,人以为神”^[4]。

宋代两淮、两浙盐称为东南盐,无论是盐产量还是盐利均居全国首位,其中两淮又是最为重要的。明清时期的两淮盐业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无论是盐场规模、产盐量,政府规定的额引数、行销区域范围,还是国家盐税收入,均位居国内前列。扬州盐业的最盛期正是在明清之际,南河下与扬州盐业的关系主要也就在这个时期。

二、盐商聚集——南河下的兴起

扬州古城有新城、旧城之分,大体以小秦淮河为界。南河下位于新城。新城始建于明代中期。元末,扬州遭遇战祸,城池几为废墟,明初,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扬州城区开始由东、南两方向运河延伸,到嘉靖中后期,在旧城外环河增筑新城。

扬州新城初兴,直接得益于发达的盐业经济。自洪武三年起,明朝设立开中法,在扬州设立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地点在大东门外。于是,大批西北的晋商、陕商和临近的徽商来到扬州,从事盐业贩运。这些盐商的到来,盐务官员不得不陆续在衙门西、南两面建房百间,供人居住。弘治年间,明又实行开中折色制,扬州的盐商数量再度增加。这些人或在原籍地、寄居地(扬州)间奔走,或干脆卜居扬州,成为当时的“新扬州人”,其中,以徽商为最。近人陈去病有“扬州是徽商的殖民地”之说^[5],此言至恰。当然,除盐商外,还有其他人亦来到扬州。明代嘉靖年间,新城区加筑城墙,扬州盐商出借三万两白银,新城全长十里,有七个门。其中与南河下关系较近的有挹江门(钞关)和便门(徐凝门、徐宁门)。

新城与盐商的关系很密切。在新城,盐商比居,门宇峻整。《芜城怀旧录》记载,乾隆南巡到扬州的时候,问侍奉母病在家的扬州进士秦蕡新、旧城有何区别?秦蕡回答他说,新城盐商居住,旧城读书人居住。乾隆赐他一块匾,亲笔题词“旧城读书处”^[6]。清代扬州的河下街就是由盐商逐渐建筑而形成的。“河下”的意思,就是运河大堤之下。河下街分北、中、南三段,南河下即是其南段。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云:“钞关东沿内城脚至东关,为河下街。自钞关至徐宁门为南河下;徐宁门至缺口门为中河下;缺口门至东关为北河下。计四里。”^[7]今因历史变迁,城市改造,中河

下、北河下均已残缺,只有南河下老街尚存旧貌。

三、食盐专营——盐商富起来的奥秘

扬州瘦西湖白塔的传说反映了盐商个个都是财富巨子,他们“富者以千万计”“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两淮盐商的财富既来自于“淮盐”的“量大利厚”,更得益于国家的食盐专营制度。食盐专营简单地说就是把食盐当成一种专卖产品,由国家加以控制。国家之所以要这样做,根本原因是为了财政收入。在我国历史上,盐税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种,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时占到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而两淮的盐税又占到近一半之多。仅以清朝为例,嘉庆《两淮盐法志》说:“佐司农之储者,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山海天地之藏,其有关于国计民生者,与农桑等。”^[8]序盐税收入成为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种。无怪乎乾隆时两淮巡盐御史李发元称:“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8]卷五十五·碑刻下·盐院题名碑记

盐商发展的鼎盛期是由明代的“开中法”促成的。之前,唐代有榷盐法、宋代有“折中法”,明代的“开中法”就是在宋折中法的基础上实施起来的。商人运粮草、布匹等物资至边境,政府给“盐引”,商人再凭引到两淮指定盐场支盐,然后到指定的行销地(引岸、销岸)售卖,这就是“召商输粮与之盐”。尤其是万历四十四年,两淮盐法疏理道袁世振创行“纲盐法”,规定凡纲册上有名的商人世代继承食盐专卖,无名者不得行。“纲盐法”的实施把之前“开中法”制度下商人自愿参与交易的原则,变为世袭承包盐引的原则。从此以后,由官专卖演变为官督商专卖制,或称为委托专卖制,盐的承销由个体商人转为有组织的商人集团。

四、引市街——话说盐引

扬州并不直接产盐,扬州能够成为“淮盐”产销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南河下历史文化街区的“引市街”其街名能说出其中的道理。

引市街,曾被称为李大官人巷,后改名为“引市街”。为什么要更名?原因就在“盐”上,因为“盐引”交易成了这条街的主要功能,街因事名,可谓一业兴街。这条街,今天来看算不上热闹繁华,甚至还有点冷落,可在当年,它却是车马辐辏,

流金淌银。

引市街的“引”即指“盐引”。盐引,俗称“窝子”,是食盐装运的计量单位,同时又是盐商贩运食盐的专利凭证,它由政府发出。商人如果想要合法贩盐,必须先向政府取得“盐引”。每引一号,分前后两卷,盖印后从中间分成两份,后卷给商人的,叫“引纸”——盐引;前卷存根叫“引根”。商人凭盐引到盐场支盐,再到指定销盐区卖盐。

明代中后期,盐法败坏,为保证国家能顺利地收取两淮盐课,朝廷于万历四十四年设立疏理道,派出袁世振清理两淮盐政。疏理道是临时性机构,随着官课的疏通、积引的清理,盐法改革的成功,这个机构也就“寿终正寝”了,官署改为大淮提寺,原先由东关街通往官署的路就称为“疏理道”,成了巷名。

盐引反映出的盐商特权到清道光十一年后发生了剧烈波动。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陶澍奏准,在淮北改“纲盐法”为“票盐法”。此法规定,凡商人购买十引为一票(产盐区州县一引也可起票),照章纳税,然后凭票购盐赴引岸销售。道光三十年,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陆建瀛在淮南推行此法。“票盐法”的实施,取消了商专卖制,对盐商打击重大。

取消食盐的商专卖制甚至国家专营制应当是历史的大趋势。然而,世事难料,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给盐商带来了二次生机。当时,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曾国藩为保证清政府的盐税收收入,吸引大商人前来行盐,于同治三年规定,凡行销湘、鄂、皖、赣之盐,须以五百引起票,盐商的办运成本,大票银为五千两,小票银为一千至二千两,此法排斥了小本盐商的行盐资格。后来,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他于同治五年借筹措军饷之名,下令扬子四岸的盐商报效捐款,将淮盐运销作为票商的专利权,票商在完纳预厘、报效后,可循环转运。以后,李鸿章提出清水潭工捐,每引零点六两,湘岸每引零点五两,赣岸每引一点四两,皖岸每引一两,以此作为票本。此时票盐法虽无纲法之名,而有纲法之实。纲盐法死灰复燃,引岸专商继续垄断淮盐市场。

盐引作为一种特种经营的票据,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引市街的“引”就是盐引。这条南北向古街,南到南河下,北接广陵路(左卫街)就是明清时期扬州盐商进行盐引交易的场所,可谓当时扬州的金融中心。名义上,盐引是无价证券,实际

上,盐引具有相当大的经济价值——实质为特权价值,有了它,翻云覆雨,便可坐收渔利。因利益之故,暗底下,扬州城潜伏着买卖盐引的黑市,贩子们麇集在一起,倒腾盐引,买进卖出,投机获利。因黑市地点靠近盐商居住集中的地方南河下,久而久之,买卖盐引最集中的小巷,就被称为“引市街”了。在扬州引市街,每天众多盐商聚集于此,专门囤积引窝,坐收倍利。因为扬州出去的盐行销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地,市场浩大,所以引市街的交易行情,像指挥棒一样,甚至能遥遥影响这些地区食盐价格的起伏涨落。

五、两淮盐运使公署——扬州在两淮盐业中的产业分工

如果说盐业是一根产业链,那么,扬州在其中的地位主要是代表国家管理食盐的销售(物流)环节。为此,二千年来,扬州一直有国家设立的盐业管理机构。

扬州的食盐销售管理从汉代就已经开始。汉武帝元狩四年在淮南广陵设均输官,管理销盐事宜。武帝时还设置了盐渎县,管理产盐的“亭户”。汉献帝建安元年,在广陵设监卖机构,负责监治盐务和食盐的销售。

唐朝时,扬州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增强。唐玄宗开元元年,国家在扬州设立转运院,代宗宝应时,刘晏在扬州设立榷监院,管理、监察销盐事宜。

宋太宗雍熙年间,国家在扬州、镇江、泗州、仪征设置四个巡院,负责监督、管理盐的销售。宋神宗熙宁三年在扬州设置都转盐使司。

元世祖至元八年,两淮盐区管理机构名称,由转运使院改为都转盐运使院,委正、副使,负责场灶生产,榷办盐务事宜。

明洪武元年,中央由户部主管全国盐务,两淮盐区设巡盐御史,为朝廷特派专员,负责整个盐区的监管,初不为常制。正统元年后,按巡按例,一岁更代,以为常。明王朝在两淮又设置了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负责盐区的产、运、销事宜。两淮都转运盐使司下辖泰州、通州、淮安三个分司,淮安、仪征二个批验所,有大使、副使,负责食盐的批引掣放事宜。永乐十二年曾裁撤巡盐御史,改由巡河御史兼理盐政,设御史二员。万历四十四年,两淮设盐法疏理道。

清代,中央由户部职掌政令,专司奏销考成,具体由山东司考核。在两淮盐区设置巡盐御史一

人,定制一年更代,名为“盐差”,康熙后改为“盐政”。巡盐御史或称盐课监察御史、盐政监察御史,为地方盐务的最高行政长官,以都察院奏差者,以特旨简充,各带原衔品级,由内务府官员简充者,仍带御史衔。两淮巡盐御史巡视两淮盐课,统辖江南、江西、湖广、河南各省、府州、县额引的销售,监督户部所属运司、分公司、场灶的生产、运输管理、查缉私盐等。

两淮巡盐御史衙署为盐漕察院,又称为扬州使院、扬州盐院。衙署有二处,一处是在扬州府城内(原新华中学、文昌阁东北),一处是在仪征城南。因仪征滨江,那时,每年四月,两淮盐业的主管官员都要率领各大盐商到这里集中,举行开江大典。从这天起,两淮盐商的盐船便开往湖南、湖北、江西等政府指定的销售地点。

民国元年在扬州设两淮盐运使公署,同年,南京设江苏盐政总局,当年十月,改江苏盐政总局为两淮盐政总局,后又恢复两淮盐运使司旧制。

民国二年,北洋政府在扬州设立两淮稽核分所,主管两淮引盐掣放和盐税征收事宜。民国二十年,两淮盐运使公署由扬州移驻板浦,淮北稽核分所经理兼任盐运使,原淮北运副改称淮南运副,机构驻扬州。民国二十三年,两淮盐运使公署改称两淮盐务管理局。民国二十六年,扬州稽核分所与淮南运副合并,改称扬州分局,下设新兴、伍佑、草埕、安梁、丰掘、余中等六个盐场公署和通、泰二个盐务支所,负责原盐生产、运输和盐务。民国二十七年,两淮盐务局移驻汉口。

至此,扬州在国家盐业中的中心或枢纽地位宣告结束。

六、四岸公所——扬州盐业的经济地理

“两淮盐,天下咸”,扬州盐业的经济地理范围很大,清代包括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六省,这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是全国划分的十一个盐区中最大的一个。这与扬州区位优势和水运交通发达相关。

古代运输,水运很重要。扬州因水而兴,扬州因水而盛。扬州“枕江臂淮”,运河贯穿南北,河网密布,适宜水上运输,这是其参与食盐产销并获得枢纽地位的一个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扬州在中国盐业中的独特经济地理,可以通过南河下的“四岸公所”及其“岸”字来说明。

南河下历史文化街区特别是南河下街汇集了

多个盐商私宅、会馆或其他涉盐建筑,其中“四岸公所”最特殊。所谓“四岸公所”,是指清代、民初湘、鄂、赣、皖四省盐务通商口岸在扬州的联合办公之所,是四省大盐商核定平衡盐价、产、供、销、运等事宜聚会决策的地方。其中的“岸”指“引岸”,又称“引地”,是请引行盐的盐商的专卖区。“四岸”即上述四省,它们是淮盐的主要专营区域,当然也是扬州盐业在全国的主要经济版图。

扬州与“四岸”的关系靠长江来联系。有清一代,各大盐场营运皆有定法,营销有固定区域,盐船停靠销售亦有固定地点。清代规定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及湖南的大部分地区皆是淮南、淮北两大盐场的引地。“淮盐”从产地运到扬州,再从扬州入长江,而后远销“四岸”等地。在这一流通环节中,盐商取得大利,政府亦征得可观的盐税。

国家实行“纲商引岸”制度,使盐商、政府双赢。其内在机理是:盐商运销食盐,须先向盐运司交纳盐课,领取“盐引”,然后到指定的产盐区向灶户买盐,再贩往指定的行盐区销售。但是,盐引并不能随便领取,商人必须以“引窝”(又称窝根、根窝)为据,证明自己拥有运销食盐特权。为了得到引窝,商人又必须事先“认窝”,也就是交纳巨额银两取得官府授予的垄断经营权。“纲商引岸”制度使盐商基本上垄断了全国的食盐销售,因此他们可以任意压低买价,抬高卖价,获取巨额利润。

太平天国时期,“淮盐”流向“四岸”的通道被阻隔,以致清政府不得不出“川盐济楚”的救急之策。太平天国以后,在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等人的干预下,“淮盐”引地陆续恢复。不过,这已是落日时的一点余晖。直到清末,尽管各方都承认湖广是“淮盐”引地,但“淮盐”计岸一直无法收回,楚地的专商引岸制受到沉重打击。

民国时,扬州盐商虽然还能继续享受政府赋予的食盐专营权,但却无法和唐代以来的盛景同日而语了。

七、盐商——南河下的主人们

扬州盐商是由陕西、山西、徽州、湖广、江西、江苏等地域性商人构建而成的一个群体。他们给世人的最深印象就是富裕,称他们富可敌国都不为过。此外,他们还与其他各界联系颇多,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都与扬州盐商有说不清道不明

的联系。他们是扬州历史的一部分。

盐商享受的是国家政策的“红利”，食盐专营制度给了盐商两大好处：一是无竞争对手，二是买进卖出的巨大利差。可以说，盐商凭实力获得了专营权，又凭专营权增强了实力。如果不是遇到意想不到的大灾大难，盐商是不可能亏本破产的，他们所想的无非是利润之厚薄。

食盐是需求量很大的生活必需品。对国家来说，它是税收的一个主项。而对盐商来说，盐业又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乾隆时有人说：“天下第一等贸易为盐商，故谚云：‘一品官，二品商。’商者，谓盐商也，谓利可坐获，无不致富，非若他途交易，有盈有缩也。”^[9]明代宋应星在《野议·盐政议》中说：“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10]。利润率高达百分之三十。如此高额的利润率的获取，其重要原因是盐产地价格与销地价之间的价格差。

盐法的变更，特别是盐商专卖制的实施，运销食盐成为某些商人的世袭专利权，他们垄断了食盐的交易。明清时期盐法的演绎，育成了一批两淮盐商，他们手中握有巨额的资本金。明代万历时，扬州盐商有资本三千万两，到了清代，据汪喜孙称，世盐于扬州的山西、徽歙商人，蓄积的资本达到七八千万两之巨。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中央户部库存银不过是七千八百余万两，中央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四千余万两。所以有人说：“彼时盐业资本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无怪乎乾隆帝也发出感叹：“富哉商乎，朕不及也！”这批盐商中，个人资本也十分雄厚，明代时，上贾资本为百万，二三十万则为中贾，到了清代，百万以下者不过是小贾，上贾资本千万^[11]。

在清代前期，著名的盐商有：黄莹、黄晟、黄履灵、黄履昂、江嘉谟、吴禧祖、郑子彦、郑元勋、郑元嗣、郑元化、郑侠如、汪应庚、郑鉴元、鲍志道、江春、洪征治、汪廷璋、马曰琯、马曰璐、王履泰、尉跻美、黄濛泰、安麓村、山西亢氏等，清末及民国初年，如周扶久、萧怡丰、朱幼鸿、常裕川、周学熙、汪鲁门等都是有名的大盐商，他们在两淮盐界影响都很大。

以上著名盐商中，像江春、周扶久、汪鲁门等即安居于南河下历史文化街区及其附近。

明清时期，政府为加强对盐商的管理还成立了盐商组织，在两淮的盐商组织称为“盐商公所”，盐商组织的首领被称为“总商”，一般由财力

雄厚、组织能力较强的大盐商担任。总商主要任务是为官府向盐商催征盐课，宣传贯彻政府的盐业政策，有时又参与政府盐业政策的制订，向盐政官员转达盐商的要求和禀请。总商是介于官商之间的人，是盐商和政府之间的协调者。一方面他有政府专员的身份，有管理其他盐商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也是盐商们的代表，代表盐商的利益。在总商制度下，如果有盐商拖欠税收的，就由总商带领其他盐商共同陪补，有了总商，政府的税收也就有了保证。此外，如果政府需要盐商们额外掏腰包的时候，也先通知总商，让总商向下摊派。

八、扬州——徽商的第二故乡

扬州盐商中，来得较早的是晋商。嘉庆《江都县续志》记载：“扬以流寓入籍者甚多，虽世居扬，而系故籍者亦不少。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麇至。三原之梁，山西之阎、李，科第历二百余年。至于河津兰州之刘，襄陵之乔、高，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临潼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12]这里的盐法指的是“开中制”与“折色制”。

晋商原本主要在北方经商，之所以南下扬州，这还是与盐法有关。明代中期，盐法由“开中制”改为“折色制”，“边商”逐渐衰弱，而控制两淮盐场的“内商”却获得迅速发展。当时，业盐的晋商追逐商机，纷纷来到了扬州。嘉靖时，在扬州的晋商人数达数百人，有名的如太原望族贾氏、代州杨氏、临汾亢氏、大同薛氏等。晋商在扬州的历史遗存主要有：山陕会馆、小盘谷、二分明月楼、三义阁和小秦淮公园。其中多数属于或邻近南河下历史文化街区。

清初扬州有“秦音歙语满街巷”之说，可见当时晋商与徽商是扬州数一数二的两大商帮。但后来，特别是到清末，徽商的势力则明显超过了晋商。晋商中有不少人从盐业转向了票号业。这里面原因很多，地缘因素（徽商的家乡比晋商明显靠近扬州）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不过，还有一个因素值得关注，徽商比晋商更注重商途、仕途的同步发展，这个特点十分切合当时的“国情”。

徽商与扬州的关系之密切，可从民国陈去病的一句话中看出。他在《五石脂》中写道：“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5]他的这句话应当不仅是讲扬州徽商多，更重要的是强调徽商在扬州的影响力以及他们对扬州的不凡贡献。

明清时期,扬州由盐业而盛,扬州是两淮盐业营运中心,是扬州最为繁华的时期。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乾嘉,两淮盐商中,徽商都为实力派。依据《扬州画舫录》一书的记载,徽州人在扬州经商的就有马、鲍、郑、巴、江、黄、吴、徐、程九个家族、八十一人,且都是著名的商人。徽商称雄扬州,不仅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资本雄厚,不少人在两淮被称为首商或总商。

徽商在扬州发了财,其部分财富转移到了他们的老家,但亦有相当部分回馈给了扬州,实现了财富的“在地化”。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园林修造,扬州的著名园林几乎都是徽商所有。此外,在文化建设上,徽商在扬州办教育、建书院、兴诗社、蓄戏班、演戏剧、印图书、藏古籍、研经史、行医术,

使扬州不仅成为当时中国东南地区商业大都市,而且成为东南文化基地之一。扬州学派同徽派朴学关系密切,“扬州八怪”中有两位(王士慎、罗聘)是徽州人,徽派篆刻“歙四家”中的程邃、巴慰祖长期寓居扬州,“四大徽班”也是从扬州进京的。

在市政建设上,徽商也是功不可没。前文写的扬州“新城”建设,盐商(包括徽商)就起过关键作用。到明末清初,扬州又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徽商以其一部分商业利润用于“治坏道”“葺废桥”“治街肆”“修马头”。如歙县鲍志道,嘉庆时为两淮总商,当时扬州至康山以西,至钞关北抵小东门,地势洼下,街衢容易积水,鲍志道便出资将街面砖改为石板路,抬高地面,使积水得以清除。

参考文献:

- [1] 潘超,丘良任,孙忠铨,等.中华竹枝词全编(三)[Z].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7:163.
- [2] 林振翰.淮盐纪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15.
- [3] 张荣生.中国历代盐文学作品选注[Z].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51.
- [4] 宋祁,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796.
- [5] 陈去病.五石脂[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326.
- [6] 董玉书,徐谦芳.芜城怀旧录·扬州风土记略[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39.
- [7] 李斗.扬州画舫录(插图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7:126.
- [8] 佶山.(嘉庆)两淮盐法志[Z].扬州:广陵书社,2015.
- [9] 张守常.中国近世谣谚[Z].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705.
- [10] 宋应星.天工开物[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253.
- [11] 薛平,朱宗宙,黄继林.滨江名镇:盐都十二圩[M].扬州:广陵书社,2007:46.
- [12] 王逢源.(嘉庆)江都县续志[Z].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508-509.

Nanhexia: Mirco Perspective of Salt History in Yangzhou

XUE Pi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China)

Abstract: Salt industry in Yangzhou started in the West Han Dynasty, and flourish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which is the time Nanhexia and Yangzhou establishing relationship. In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 Yangzhou constructed new city, Nanhexia was a part of the new city where salt traders inhabited together. Many remains and legends about salt traders and salt industry preserved in Nanhexia. Yangzhou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Hai Salt" producing and trading chain. It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street name of "Yinshi Street". The specific economic geography of Yangzhou in Chinese salt industry can also be illustrated by "four shores public office" and its "shores". Recently, Nanhexia is an important tourist area of salt culture in Yangzhou. Nanhexia improved half part of salt history in Yangzhou.

Keywords: salt industry; salt traders; Nanhexia

(责任编辑:陆 勇)